

李伟国 曹正文 主编

我与辞海

WO YU CI HAI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伟国 曹正文 主编
托普集团 策划

我与辞海

百岁老人 夏征农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辞海/李伟国,曹正文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9

ISBN 7-5326-1357-7

I. 我... II. ①李... ②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249 号

责任编辑 秦振庭 陈 乐

封面设计 汪 溪

我与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江杨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 插页 1 字数 176 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357-7/G · 473

定价: 15.00 元

我与辞海征文大赛评委名单

徐中玉	巢 峰	金福安	李伟国
朱大建	朱明钰	徐庆凯	李安瑜
杨 桦	乐嘉民	路 军	曹正文

序

汪道涵

学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全面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才能出色地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我始终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辞书的出版,来推动和影响文化的发展。《辞海》这样做了,因为《辞海》在读者心目中已经享有这样的地位。“查《辞海》”、“看看《辞海》是怎么说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从历史的角度讲,我看到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这几部新中国大辞书的诞生,盛世修典,躬逢其时,不亦乐乎。关于《辞海》,我很高兴参加了它的几次很重要的工作会议,了解《辞海》的编纂过程,对《辞海》有着一种亲近的情结。

我本人,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知识也很有限。回忆起来,有过一段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起来,又被下放,一些书都不让带。怎么办呢?辞典总可以让人带,于是我就把一部十六本的《辞海·试行本》装了半个箱子,随我去“五七干校”。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这十六本书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陪伴了我,我不感到寂寞,我从中查词汇,解决读书时遇到的疑问;读一个个词目的释文,代替了平时的读书习惯,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套书我曾经保存了很久,后来搬家时,人家把它当作旧书烧掉了,非常可惜,因为上面还有我自己记的一些东西。当我翻阅后来出版的新《辞海》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十六本书,印象特别深。《辞海》,我几乎每天要用,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要请教,它是无声的先生,无声的先

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要请教有声的先生,请教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前辈和有学问的年轻人。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江泽民等都非常关心《辞海》的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辞海》的工作。1999年版《辞海》的编纂工作,上海市委常委会专门对此作了研究,做出了给予财政方面资助的决定。江泽民同志曾经两次为《辞海》题词,出席《辞海》的编纂工作会议,并接见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1985年2月,因为会议冲突,原定参加《辞海》工作会议的议程只好临时改变,我转达了“祝贺辞海编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愿为进一步发展贡献我的绵薄”的由衷情感。

《辞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辞海精神”值得弘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辞海纪事》,记述《辞海》几十年的编辑过程,事例很多,要我题写书名,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辞海》的编纂经验有两个基本办法,一是“吃四方”,就是把全国的精英成就集中起来;另一个是诸葛亮的办法“草船借箭”,国外有许多好东西,我们去把它们引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够集中世界上人类历史、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精华。

“知识如海,学问无涯。”这是我常以此自勉的一句话,查《辞海》、读《辞海》的过程中也时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199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我即以此八字书赠出版社,藉此征文大赛的机会再次提出并愿与大家共勉。

目 录

序	汪道涵	(1)
辞海汪洋景万千	苏步青	(1)
愿君多采撷	谈家桢	(2)
增修不断各忘年	袁沛然	(4)
我与《辞海》的渊源	曾彦修	(5)
在工宣队领导下“定稿”	冯英子	(9)
以仔细、负责、敬业、乐群为法则	徐中玉	(11)
浦江饭店与《辞海》未定稿	蒋学模	(12)
《辞海》引我进入辞书的海洋	蒋星煜	(14)
情系《辞海》	杨雄里	(16)
《辞海》是我的恩师	李伟国	(17)
我与《辞海》经验	徐庆凯	(19)
我上“辞海老年大学”	周明鉴	(21)
几看人间岁月新	张枋之	(23)
“浦江集中”和“四路出差”	汤志钧	(24)
从背《辞海》到编《辞海》	熊月之	(26)
我为《辞海》解惑 《辞海》为我释疑	赵寿元	(28)
《辞海》无涯勤作舟	章人英	(30)
鱼水之情,岂能相忘于江湖?	王鹏飞	(31)
《辞海》与上海气象业务现代化	束家鑫	(33)

我写宇航学科条目	何正华	(35)
煞费苦心配插图	陈 多	(36)
《辞海》伴我一生	洪 波	(38)
愿做《辞海》一滴水	王瑞祥	(40)
见证《辞海》的发展	钱子惠	(41)
《辞海》雨露四十年	薛国屏	(43)
十上北京觅彩图	杨宝林	(44)
审稿往事	孙厚璞	(46)
一段难忘的经历	曹中孚	(49)
曲折和喜悦	任唯铨	(51)
《辞海》:牵着我的情感	赵兰英	(53)
教我如何不想他	苏培成	(54)
《辞海》是知识创新的活海	龚介民	(56)
《辞海》是知识的航标灯	王雅军	(57)
《辞海》是有言无声的大师	王雪松	(59)
《辞海》使我圆了作家梦	郎慕中	(60)
《辞海》,我的心灵按摩师	许顺利	(62)
一个游子的《辞海》情缘	李春平	(63)
面对《辞海》的思考	姚华飞	(65)
生命中的拐杖	端木昌	(67)
查《辞海》的乐趣	朱亚夫	(69)
永远的老师	沈方德	(70)
《辞海》和三代读者	朱易安	(72)
一部《辞海》,四代同爱	周锡安	(74)
《辞海》情缘六十春	宋连庠	(75)
我的《辞海》缘	高伯舟	(77)
我掉进了“海”里	傅德华	(78)

抄《辞海》 买《辞海》	张林凤	(80)
买《辞海》的心情	何立洲	(82)
从相见到拥有	孙丽芬	(83)
我的两部《辞海》	周永孚	(85)
我的《辞海》和女儿	钟同福	(87)
我有四本《辞海》	黄汉雄	(88)
我的五套《辞海》	石定枋	(90)
1981 年,我买到了《辞海》	张国栋	(91)
新世纪,我买了《辞海》	温荷生	(93)
十年寻觅始如愿	王 政	(95)
挪用“公款”买《辞海》	张崇信	(97)
“直线”的启示	郭玉芝	(98)
悠悠《辞海》情	巢伟民	(100)
苦涩与无奈 欢欣与自豪	欧阳如华	(101)
家备《辞海》两地书	彭国远	(103)
指津每喜在身边	汤莲塘	(104)
学识随着《辞海》长	范国忠	(106)
我心目中的《辞海》	周文联	(107)
《辞海》伴我入洞房	曹荣新、陈银凤	(108)
情有独钟话《辞海》	姜培乐	(110)
缘定一生的《辞海》	王燕敏	(111)
我们牵手于《辞海》	蔡小平	(112)
《辞海》为媒	蔡文芳	(113)
廿载相伴	平志君	(114)
手表换《辞海》	采 诗	(116)
我奖到了一部《辞海》	庞兆麟	(117)
清贫中的“财富”	黄沂海	(118)
我与《辞海》	徐尧庭	(120)

我有位学识渊博的老师	朱少伟	(122)
《辞海》——我的大学	王 璞	(123)
我想当个“辞海人”	管志华	(124)
爷爷的期望	邢晓辞	(126)
三更有梦《辞海》当枕	张孝永	(128)
从兹努力学文化	潘 毅	(130)
步入文史殿堂	咸荣明	(132)
架起友谊桥梁	胡德明	(133)
《辞海》伴我在农场	曹振华	(135)
《辞海》助我搞科研	尤俊意	(136)
《辞海》伴我成长	李南俊	(138)
《辞海》伴我乐余年	湛创之	(139)
我的良师益友	刘 伟	(141)
感谢《辞海》分册	褚半农	(142)
我的故事	胡初才	(144)
恩师哺育两代人	丰志宣	(145)
抚卷忆琐	朱绩崧	(147)
我心目中的《辞海》	朱永年	(149)
劫年“偷书”盛世用	方克定	(151)
通读《辞海》有所得	何小颜	(152)
《辞海》助我四十秋	张健民	(153)
家有《辞海》	许家树	(155)
助编《辞海》的收获	邵 林	(156)
老伴叫称“老先生”	缪学文	(158)
我心目中分量最重的书	冯永杰	(159)
“梅开二度”觅《辞海》	胡春堂	(161)
《辞海》助我笔耕行	李家麟	(162)
“辞海精神”鼓舞我	徐 蔚	(163)

自学成才靠《辞海》	罗伟国	(165)
《辞海》中的“荷”字	叶惠麟	(167)
我有一个“文化经理”的称号	严德仁	(168)
湖笔与《辞海》	张建智	(170)
我看《辞海》印出来	张立俊	(172)
义务促销《辞海》	文先国	(173)
遨游《辞海》	白金	(175)
广采“百花”为《辞海》	雷万忠	(176)
辞海心语	许志勇	(177)
爱好	任耀明	(179)
泛舟《辞海》结情缘	赵亚山	(180)
收藏《辞海》	洪光祥	(182)
电波声中识《辞海》	张靖	(184)
夏老与《辞海》	巢峰	(186)
无名英雄真功臣	草婴	(189)
舒新城与《辞海》	王震	(191)
陈望道先生的手笔	鲍克怡	(193)
罗竹风与《辞海》	王岳	(195)
徜徉《辞海》乐满怀	秦振庭	(197)
忆孙老	原葆民	(199)
半生精力为《辞海》	迟舒	(201)
我的《辞海》缘	黄伟民	(203)
学者的风采	卢润祥	(205)
附录 漫谈《辞海》的“版”和“本”	李伟国	(208)
后记	曹正文	(212)

辞海汪洋景万千

苏步青

辞海汪洋景万千，高楼有幸集群贤。洛阳纸贵今犹昔，歇浦春寒雨似烟。宝塔原从铺底石，轻舟好挂顺风帆。争鸣端赖百家在，向党欢呼四十年。

以上是我在建党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所写的《修〈辞海〉》的律诗。今年2月24日，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到医院看望我，还送来鲜花，谈及今年正逢该社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不觉勾起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往日情谊的回忆。

记得1958年成立辞海编辑所后，我是第一批参加《辞海》修撰的。当时各界精英群贤汇集一起，以严谨的作风，一丝不苟的精神，投入紧张的编撰工作。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成了当时出版界的一大盛事，获得海内外读者赞誉，我用“洛阳纸贵”形容之，一点也不过分。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辞海》经历风雨考验，愈显出其生命力。一批编撰专家、学者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辞海》的修订工作。置身其中的我，在该社建社三十周年大庆之际，有感而发，挥笔书就：勤奋经营岁卅周，辞书质量逐年优。申江风物无边好，壮志宏图定可酬。

与上海辞书出版社交往中，还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那是1993年间，《辞海》台湾地区版问世。台湾在我心中有不寻常的记忆。1945年我曾受命赴台湾，作为接收大员之一，从日本人手中

接收台北大学,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无时不念台湾,曾写过“女娲定补鯤南天,海峡两岸盼统一”的诗句。现在,《辞海》台湾版出版了,更是一件喜事。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贺〈辞海〉台湾版问世》诗一首:辞海汪洋连海峡,喜看两岸闪新光。千枝原自同根出,花蕊应仍并蒂香。自古山川传接壤,而今文化盼呈祥。辉煌事业功成日,共为中华举庆觞。

中华民族盼望海峡两岸统一。《辞海》台湾版的出版,加固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这一举措,无疑为中华民族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建社四十周年之际,写了以上文字,作为对社庆的热烈庆贺,并期望出版社成就更加辉煌。(写于1998年3月25日)

愿君多采撷

谈家桢

20世纪50年代末,我和冯德培、王鸣岐一起受聘担任《辞海》编委、生物学科主编。当时,编《辞海》是一个十分热火的话题,原因是毛主席提议重新修订老《辞海》,由舒新城先生执掌其事,上海曾有“满城争说编《辞海》”的说法。我参加《辞海》工作也就从那时开始,至今风雨四十五载。

《辞海》编纂的起始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时一切都在“大跃进”。但是做学问容不得半点“水分”,真理必须捍卫,谬误不能在《辞海》里容身。编《辞海》毕竟是一件大事,从汇聚到浦江饭店开始定稿,学术上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时一个条目要讨

论十几次,几个月时间才能最后确定下来。生物学学术力量很强。在这个学科中,流派之争、观点之争,以及不同性格之间的碰撞,比其他哪个学科都更为集中,也更为激烈。当时最有名的是生物学界中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之争。摩尔根是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因创立和发展了基因学说获得 193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是摩尔根主持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实验室的学生,有着多年的切身体验,因此,理所当然地参加了争论,为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有关“摩尔根”的学说和观点的知识内容就介绍得比较完善,没有对摩尔根作所谓的批判,“摩尔根”条的释文称摩尔根是“基因学说的奠基人”,“基因学说”条说法是“摩尔根等在染色体遗传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遗传学理论”,给读者介绍了正确的知识。当然,我在 50 年代和毛主席两次谈论此事,我反对当时将苏联的李森科任意拔高的做法,并得到了主席的赞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候,真是有些百家争鸣的气氛。”其实,这是对科学真理的执著,对科学家责任的明确。

创新是《辞海》的生命力。生命科学是发展较快的前沿学科,生物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是基础学科,它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辞海》要为此提供更多的科技咨询。因此,我们在 1989 年版、1999 年版的两个版本中对词目作了大量的增补,释文作了很大改动。每当编辑同志送来《辞海》的稿件,我都逐一审阅,提出审改意见,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1999 年版实现了全彩色印刷,我和夏征农、钱伟长等一起热情为读者签名,宣传《辞海》。虽然很吃力,但是心里很舒畅。

我虽是编写《辞海》的一位作者,但我更是《辞海》的一位读者,经常翻检查阅《辞海》。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而《辞海》就是一部集各种知识于一体的优秀工具书。最后,我愿借用一句唐诗“愿君多采撷”和大家共勉。

增修不断各忘年

袁沛然

流光真如白驹过隙，一弹指顷，我从事《辞海》工作已整整有四十多个年头了。

我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毕生置身于中医药学的研究，虽然对文史方面也饶有兴趣，毕竟都是粗涉藩篱，造诣肤浅，独对《辞海》编写工作已近半个世纪。可以说，《辞海》的工作是我一生中的第二职业。《辞海》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它汇集百科知识，医学是其中的一门重要学科。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医学存在着中西两大学派。中西医各有所长，中医学重视整体观与辨证论治，治疗大多采用副作用极少的天然药物。在目前国际学术界兴起回归大自然的思潮下，中医药学备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政府特制订中医政策，上海市人大并已为中医立法，这都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需要。在《辞海》中如何简明扼要介绍中医学内容，以促进中医国际化和现代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难忘当年我和姜春华、张镜人先生陪同程门雪院长在“浦江”集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从早到晚非常认真地进行编写。《辞海》是权威书，中医学又如此丰富浩瀚，以有限的篇幅要较全面、正确地介绍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知识，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有商讨，也有争鸣，还征询一批学有专长的同道意见，以达成共识，往往为一条词目、一句成语，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最后定稿。这段梦寐萦怀的时间，倏已流逝，程姜二公亦先后作古，思之曷胜茫然。

《辞海》已增修数版,内容不断充实。曾记得为增写藏族医学词目,我多次跑北京,到国家民委、统战部、宗教事业管理局找有关学者多方征询研讨,才写出“藏医”、“藏药”、“宇妥·元旦贡布”等词目。又如,写著名中医陆渊雷,因资料不全,我数次到牯岭路陆府,一张一张核对有关证件,才写好“陆渊雷”这一条文。往往为几个字得花几天工夫,类似这种情况多不胜举,而后知编写难度之高。

在我的记忆里,有些事很难忘怀。如 70 年代初,“四人帮”横行,大搞所谓“批儒”,我们却实事求是地编写,并对工农兵医生解说历史事实,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儒医”、“儒门事亲”、“张子和”等词条写得比较正确。嗣后,我过黄山写了首七绝:“云端谁把两峰安,奇景多从雾里看。天意为防浩气尽,故开磅礴倚高寒。”国画大师陆俨少先生见之为我诗配画,陆公是从不轻易替人配画的高手,他的屈尊,大约因我诗寓有弘扬正气的作用。

那时,我在南昌路中医文献馆定稿,我每日中午一杯茶、一只面包用以果腹,瞌睡也不打,持续了两个多月。又在 90 年代编纂 1999 年《辞海》版,自感责任重大,乃躲进乡村小屋,有时还挑灯夜战,至二时始睡,花了数月时间写稿审稿。自知学识浅薄,惟多方请教,勤以补拙,使《辞海》古义新知,相得益彰,中医学术,远播海外,身虽艰苦,亦乐事也。

我与《辞海》的渊源

[北京]曾彦修

我是 1958 年 6 月前后在北京的中央人民出版社反右斗争之

后,得到叫我准备去沪通知的。找我谈话的,是人民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王子野同志。他告诉我,是毛主席要修订《辞海》的,并把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委,具体负责的是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负责人舒新城先生。舒老向毛主席提出的几个要求之一就是要一批编辑人员集中工作。王略知,听说中央答应由上海提出一批名单,包括著名学者和老编辑,1957年反右后,这批人均从领导岗位下来了,正好从全国调一批人去上海参加此项工作,其中包括你(指我)。我表示我不想去,因沪上我无熟人,工作起来可能不便。这一下就仍留京两年,于1960年6月初抵沪。抵沪后,我发现辞海编辑所要调来一大批所谓“大右派”,均未成功,实际连我只到了三人。傅东华这位大名人也调到了这里,一开始就担任编写全部单字的任务。

以后,在组长联席会上(我属综合组,但多数时间列席组长会),曾听过罗竹风、杭苇同志多次谈辞海创办及调人经过。大致是:1957年那次专门反“右派”的全国人大上,毛找舒新城、柯庆施在会外谈话,要求上海从速修订《辞海》,尽快出版,舒向毛提出房屋、经费、人员三大问题。毛当即要柯负责解决。至于人员,毛说,现在有那么多人“右派”没事,你何不来个“趁火打劫”,调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去,这批人去了,就可大大加快修订速度了。至于要调些什么人,上海提出,由中央通知各地准予放人就是了。毛还开了一句玩笑,对舒说:我委你当“右派总司令”,你把这些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行了。

在会上还听得:此事在上海市委是文教书记石西民负责抓,由出版局做具体计划。最先调到的负责人是杭苇,协助他的有鲁平、陈落、严霜。舒老未多管具体工作。

到北京要求调沪的“右派”名单,我记忆中似有五六十人之多,包括一些大名人如费孝通、钱伟长、陆侃如等。但均未成功,各地坚持不放。我记得很清楚,罗竹风说,各地软推,说他们不上课了,还可对中青年为主的教研组作辅导,他们完全有事可做。因此